

《“铜行灯”实为“铜镡斗”》一文献疑

吴小平 杨金东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福建 厦门 361005)

《文物春秋》2006年第1期刊登了吕波先生《“铜行灯”实为“铜镡斗”》一文,文章就1969年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一件原定名为“行灯”的器物进行了考证,作者认为是镡斗。笔者同意作者对器物并非行灯的判断,但对认为是镡斗的看法存在不同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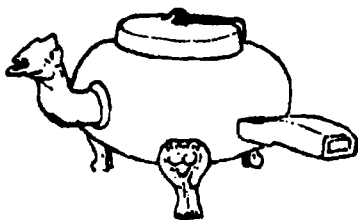
据吕文所示图片来看,该器为短直口,球腹,腹上施一圈宽沿,管口流,三蹄足,腹一侧施宽板曲柄,器形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镡斗差别甚远。后者为直腹、平底,凹槽形流,龙首形柄,二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吕文将其视为镡斗是错误的。

太原东太堡曾出土一件铜镡壶,扁圆腹,三熊状足,带盖,流为鸟首状,方盃曲柄,由于盖上刻有“镡”字,可知此类器物为“镡”,即“镡壶”(图一)^[1]。定州静志寺地宫所出的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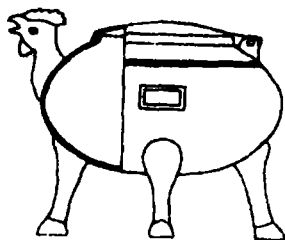
之基本相同,如直口,圆腹,三足,有流,一侧附柄,因此也应是镡壶,它们之间细部存在的差异乃所处时间先后不同所致。

太原东太堡所出镡壶为西汉前期之物,此类造型一直延续到东汉晚期变化都不大,仅足和柄稍有变动,至六朝时期变化才明显,如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2]、安徽马鞍山朱然墓^[3]所出镡壶的三蹄足修长(图二、三)。隋唐时期铜镡壶发现很少,西安梁家庄李静训墓^[4]、辽宁朝阳唐左才墓各出土一件(图四、五)^[5],它们的器形与定州所出十分相似,年代为隋—唐初,因此定州所出的年代也应在唐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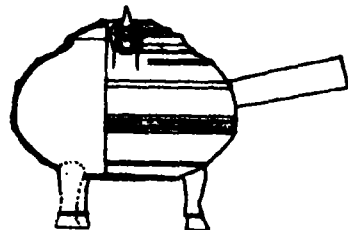
镡壶目前所见均为球腹,流有三种:管口、鸟首和龟首,而镡斗均为盆形腹,早期无流,晚期发展出凹槽流。形制不同,用途也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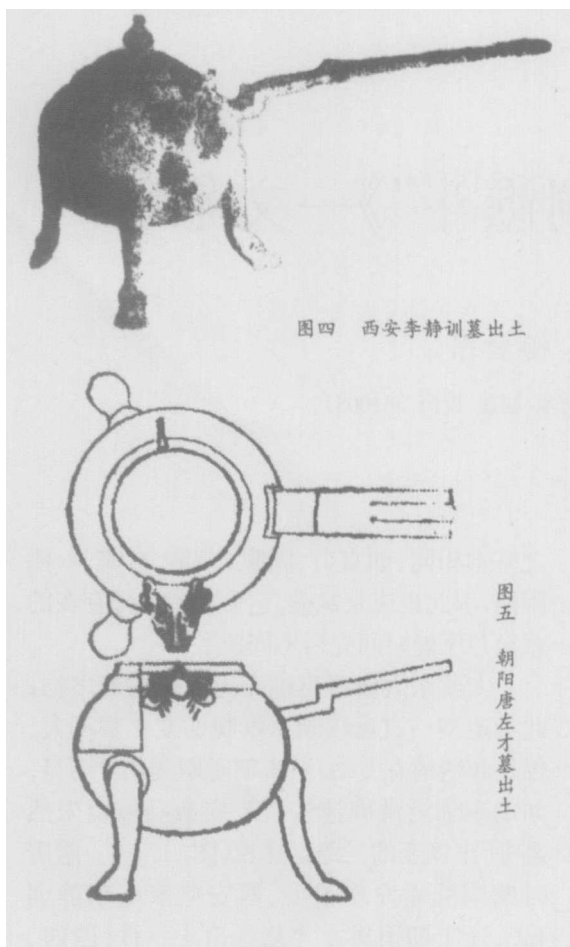
图一 太原东太堡西汉墓出土



图二 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



图三 马鞍山朱然墓出土



图四 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图五 朝阳唐左才墓出土

存在差异,孙机先生考证鑊壶为温酒器^[6],而鑊斗的器形则不宜温酒,笔者曾考证之为煮茶器具^[7]。

由于吕文引用了马承源先生《中国青铜器》中关于鑊斗的介绍,故本文在此也稍微提及一下刁斗。孙机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有一节专门介绍鑊斗和刁斗,鑊斗有三足,而刁斗无,且后者为炊器,它们并非同一器物。

[1] 戴尊德:《太原东太堡发现西汉孙氏家铜鑊》,《考古》1982年5期。

[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2005年7期。

[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5]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唐左才墓》,《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6]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325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7] 吴小平:《铜鑊斗的形制及其用途考证》(待刊)。

〔责任编辑:成彩虹〕

(上接 74 页)

此砚中的摩羯造型与内蒙古喀喇沁旗出土的唐代银盘内所饰摩羯纹较相近。另外,此龟形陶砚所饰的辅助纹饰如意朵云也是唐代器物上常用的纹饰。据此分析,此砚当为唐代之物。

龟形陶砚在唐代墓葬、遗址中时有发现,如河南上蔡县贾庄唐墓中出土的带盖龟形陶砚^[1]和洛阳隋唐东都城遗址出土的龟形澄泥残砚^[2]。正定出土的这方龟形陶砚与二者相较,龟的造型更为生动,装饰更加繁缛,尤其

是墨池内刻饰双摩羯戏珠纹,底部刻款,在唐代龟形砚中较为少见。此砚的底款也为我国古砚制作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

[1] 孙机:《摩羯灯——兼谈与其相关的问题》,《文物》1986年12期。

[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上蔡县贾庄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2期。

[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李德方:《隋唐东都城遗址出土一件龟形澄泥残砚》,《文物》1984年8期。

摄影:樊瑞平

〔责任编辑:成彩虹〕